

## 淞滬會戰期間的決策與指揮權之問題

林桶法\*

蔣的直接指揮前線作戰早已司空見慣，直接指揮對戰事有正負面的影響，本文分為三方面，首先介紹淞滬戰役前後中央與地方對日抗戰的態度及擴大淞滬戰役決策的原因；中央與地方決定擴大淞滬戰役的態度上大抵一致，差別在於地方指揮官較從軍事上考量，而蔣及中央則必須考慮到國際的因素。

其次討論攻打日本的決策時機，淞滬會戰並非一直處於戰爭狀況，而是打打停停，蔣與地方特別是與張治中之間為何時攻打、何時撤退等有不同的意見；蔣著眼於全局的考量，張治中等前線將領則重視戰略的層面，整體而言，在這方面中央與地方的立場較為一致。

最後討論淞滬戰役中的指揮及執行的問題，分析蔣如何提供前線指揮官各種資訊、調動指揮系統、直接指揮戰術等問題；抗戰期間，作為最高的領袖由於獲得的情報較為多元，著重全面的作戰規畫，地方的戰區司令則較熟悉當地的地形與地物，較清楚當地敵軍的狀況，最高統帥與戰區指揮官如能密切配合，將有利於戰鬥的進行，然由於長期以來蔣介石的領導風格，使戰地指揮官成為戰略的被支配者，就淞滬戰役而言，擴大淞滬戰事的原則

---

\*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聯絡地址：24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No. 510, Zhongzheng Rd., Xinzhu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205, Taiwan(R.O.C))

與決策並無二致，執行上則有一些問題，先是指揮系統的變動，第三戰區的指揮系統在短短二個月內進行多次調整，引起當事者的不悅，此外，犧牲許多國軍精銳兵力換取國際視聽是否有其絕對的必要及最後撤退的時機，實有檢討的空間。

關鍵詞：指揮權、蔣介石、張治中、淞滬戰役

## 一、前言

有關指揮的問題，從軍事的角度，最高的統帥本來就具有指揮的權力，抗戰期間「軍政」、「軍令」系統尚未完全制度化，1932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1935年，國民政府授階蔣介石為特級上將，依《特級上將授任條例》明定：特級上將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1943年，蔣介石接任國府主席，依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主席為海、陸、空軍大元帥，因此自抗戰以來蔣具有法定實據指揮的權力，各戰區司令官受其指揮。

蔣介石在抗戰重要會戰中的角色，贊同者歌頌蔣持久戰略的正確，批評者則認為其常干涉前方戰場，越級指揮；蔣具參謀長性格，對軍事頗有幾分自信，又掌握全盤資料，基於領導的權責，蔣對於戰場每都指揮，以抗戰時期22次會戰為例，蔣確實在戰事發生期間，幾乎每天都有重要的指示，綜合其指示內容，大約可以分為五類：其一，將情報告知當地指揮官，令其注意防範；其二，進行戰略與戰術的指導，詳細指示如何佈署、如何作戰；其三，指示如何準備工事；其四，部隊如何撤退或轉進；其五，進行前方人事的調動與調整等。

蔣的直接指揮前線作戰早已司空見慣，連中央嫡系將領也頗有微詞，徐永昌在日記中提到：「午後會報，文伯(張治中)、為章(劉斐)頗論此次第五戰區作戰，委員長逕以手令指揮湯恩伯頻頻，結果徒多失機而已。」<sup>1</sup>有關最高指揮官與前線指揮官之間的責任問題，徐更直接說：

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卸】。<sup>2</sup>

這一點，陳誠日記中提到：

為大將者不可干涉幕僚業務，不可管細事，但不能離開士兵或借他

<sup>1</sup> 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5冊，頁356。

<sup>2</sup> 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記》，第7冊，頁332。

人之手做中間之弄斷。委座一生無缺點，惟對於幕僚不甚放手，且管細事而離開人民與士兵，且不能解決人民與士兵的痛苦。<sup>3</sup>

但也有將領指責統帥部的其他高級將領，丁治磐認為最高統帥部「只絞領袖一人之腦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屢進屢退之列，對戰場實情尚多隔閡。」<sup>4</sup>

到底最高指揮官與前線指揮官的戰事責任問題，可能必須作更細的討論，蔣的直接指示或提供作戰情報也不一定全無貢獻，而且身為最高統帥較能全盤掌握戰局，並進行有效的調防，對於前線的戰事亦有助益。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蔣並未全面發動對日抗戰，其因：華北地形不利國軍與日本正面對決，當時國軍缺乏現代化裝備及強大火力，如在平原交戰必將陷於被動地位，而且華北軍政大權操在地方軍人之手，地方部隊裝備落伍且相互撻伐，國府無法全面控制，此外蔣亟思以外交途徑解決中日紛爭，因此淞滬戰役才是真正的抗日行動的開端。

當時全國對日的態度漸漸趨於一致，對日本已不再採取「不抵抗」政策，蔣介石的對日大戰略——「以空間爭取時間」、「持久戰略」等也獲得多數人的認同，但在會戰中的戰略與戰術則有不同的意見，有關淞滬戰役，許多學者關注在「軸線移轉說。」<sup>5</sup>所謂軸線移轉戰略，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為吸引華北日軍至上海，第二為轉變日軍進攻軸線，使其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進攻。本文不作進一步討論，僅以淞滬會戰的決策與指揮權作為討論重點。

<sup>3</sup> 陳誠，《陳誠日記》（國史館典藏，數位板），1946年1月27日。

<sup>4</sup>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2冊，頁90-91。

<sup>5</sup>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北京，1992），頁1-21；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北京，1994），頁213-220；彭孟興，〈蔣介石上海抗戰決策研究〉，《軍事歷史研究》，第1期（南京，1994年），頁55-64；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北京，1995），頁45-60；姜良芹，〈從淞滬到南京——蔣介石政戰略選擇之失誤及其轉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1期（南京，2011），頁103-115。

## 二、淞滬戰役前後中央與地方對日抗戰的態度與決策

淞滬戰役的起止時間是 1937 年的 8 月 13 日到 11 月 12 日，8 月 13 日，日軍集結駐滬陸軍及海軍陸戰隊約萬餘人，向上海地區保安隊進攻，張治中主動迎擊，揭開淞滬戰役序幕。<sup>6</sup>作戰地區廣及京滬杭一帶，這個地區位居中國東沿海地區之中央，長江下游之南岸，華北大平原之南緣，東南丘陵地帶之北緣，具重要的戰略地位，此外，上海自清季以來，不論在國際、在海運或對中國內河航行上極為重要。

國軍選擇在上海主動先發制敵亦有多重考量，首先是以上海為出擊點，可佔先機之利。其次從全局戰略言，在上海發動主攻，還可吸引華北敵軍兵力，遲滯敵人在華北的進攻。第三，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地形也促使中國軍隊對日發動進攻。第四，從政略上的考量，就國際關係言，上海是國際都會，在此作戰易引起國際的干預與同情，對於爭取國際輿論幫助有一定意義。<sup>7</sup>

淞滬會戰開戰前，受制於 1932 年「淞滬停戰協定」，上海市區內僅駐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所指揮之上海市保安總團(團長吉章簡)、上海市警察總隊及上海市保衛團(團長姜懷素)等部隊，兵力單薄。

早在日本發動七七事變之前，蔣介石及陳誠即有以上海為決戰地，以誘敵自東向西的計畫，1936 年 10 月份，陳誠提到：

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畫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爭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及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及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立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sup>8</sup>

這一構想成為淞滬事變之初，陳誠率向蔣提出「擴大滬戰」的戰略性計畫的藍圖，南京最高統帥部有鑑於上海及滬寧杭地區在政治、經濟及國

<sup>6</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4)，上冊，頁52。

<sup>7</sup> 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頁52-54。

<sup>8</sup> 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頁22。

際的重要姓，乃決定「先發制敵」策略，1937年8月14日，國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同時，軍事委員會以京滬警備部隊改編為第9集團軍，張治中任總司令，轄3個師1個旅及上海員警總隊、江蘇保安團等部，擔負反擊虹口及楊樹浦之敵任務；蘇浙邊區部隊改編為第8集團軍，張發奎任總司令，守備杭州灣北岸，並掃蕩浦東之敵。

8月15日，國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下達全國總動員令，將淞滬地區劃為第三戰區，任命馮玉祥、顧祝同為正副任司令長官，以保有經濟策源地、迅速圍殲上海附近之敵、打破日軍在沿海沿江登陸之企圖、阻止後續敵軍之登陸等任務，<sup>9</sup>參戰部隊約50餘師，近七十萬人。

淞滬會戰開戰之初，國軍在上海的兵力計有第三十六師(宋希濂)、第八十七師(王敬久)、第八十八師(孫元良)、獨立第二十旅、淞滬警備總團等部隊，多為中央嫡系部隊，裝備精良。其後蔣介石先後命駐蚌埠之第五十六師等部隊開赴上海參與作戰，援軍愈來愈多，但也使國軍陷於日本的炮火中。

淞滬戰役初期(8月13日之後至9月初)戰鬥序列如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轄第八集團軍(張兼)、第十集團軍(劉建緒)、另有第九集團軍(張治中)、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陳誠為前敵指揮官(8月18日任命)兼第十五集團軍司令，第十九集團軍(薛岳)及直轄部隊九個師。<sup>10</sup>9月之後的戰鬥序列稍有改變，包括：第八集團軍(張發奎)轄第二十八軍(二個師)及第五十五師等；第九集團軍(張治中，9月21日由朱紹良接任)，轄右翼軍(孫元良)、左翼軍(王敬久)等；第十五集團軍(陳誠)，轄右翼軍(胡宗南)、左翼軍(劉和鼎)、中央軍(羅卓英)等。<sup>11</sup>9月20日以後，蔣兼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仍由顧祝同以副司令長官身分傳達命令，整個戰役兵力包括：淞滬地區：指揮官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轄第三十六師、第五十六師、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第九十八師、獨立第二十旅、淞滬警備部隊、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上海市保衛團暨砲兵四個團等；長江南岸守備區：指揮官第五十四軍軍長霍揆彰(10月就任)，轄

<sup>9</sup> 〈淞滬會戰〉，檔案管理局，《國軍檔案》，檔號0026/152.2/3813，頁32。

<sup>10</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臺中：永達清出版社，1986)，下冊，頁672。

<sup>11</sup> 〈淞滬會戰〉，檔案管理局，《國軍檔案》，檔號0026/152.2/3813，頁241。

第十一師、第十四師、第六十七師、砲兵第十六團；長江北岸守備區：指揮官第一一師師長常恩多；杭州灣北岸守備區：指揮官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轄第六十一師、第六十二師、第五十五師、第五十七師、獨立第四十五旅、砲兵第二團；浙東守備區：指揮官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10月就任），轄第十六師、第六十三師、第十九師、第五十二師、新編第三十四師、獨立第三十七旅、暫編第十一旅、暫編第十二旅、暫編第十三旅等部隊。<sup>12</sup> 這些還不包括後來的援軍。

淞滬戰役相關的負責將領甚多，包括顧祝同、張治中、張發奎、陳誠、宋希濂、王敬久、孫元良、朱紹良、廖磊、白崇禧、胡宗南等人，包括嫡系及非嫡系將領。淞滬戰役的戰鬥序略，亦不斷作調整，9月20日之後蔣的指揮較能貫徹，但也需為撤退過晚的決策負其最大的責任。

蔣介石與上海的淵源極深，長期以來亦關注上海的戰略價值，盧溝橋事變後即要求參謀本部擬辦〈掃蕩上海日軍據點計畫〉，該計畫由羅澤闓起稿，計畫出敵不意，夜間奇襲，迅速占領虹口等地區各日軍據點，及佔領沿江要點，阻止日軍登陸增援，目的是先聲奪人，取得初戰勝利。

雖然李宗仁認為蔣介石決定在淞滬與日軍對戰的動機為：可能是意氣用事、可能是他對國際局勢判斷的錯誤、由於蔣不知兵等因素。<sup>13</sup>但此為李宗仁的後觀之見，國府對上海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戒，從全盤的戰略言，在上海發動主攻，可吸引華北的日軍，因此當時時任作戰部長的黃紹紘也認為：「八一三事變的發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亦可說日本是被動的，而我國是主動。」<sup>14</sup>蔣也強調在上海作戰是要打破日本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計畫集中兵力攻擊華北。<sup>15</sup>陳誠亦提及：「現在我之方針在持久戰，若能多持久，敵方崩潰即為我之勝利，故國際上現雖因國聯開會關係，但終究視

<sup>12</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日戰史》（淞滬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9-12。

<sup>13</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678。

<sup>14</sup> 黃紹紘，《黃紹紘回憶錄》（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339。

<sup>15</sup> 秦孝儀主編，〈蔣委員長對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訓詞（上）〉（1938年1月11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作戰經過（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頁65。

我力量為何，倘我獲最後之勝利，則國際之態度，亦必轉變也。」<sup>16</sup>這些都可看出淞滬戰役絕非出於意氣用事。

陳誠在 1937 年 8 月 7 日電呈蔣應抱積極抗戰的態度，全面抗戰，才能得到萬一之和平。<sup>17</sup>其他的將領如張發奎也同意開闢第二戰場，發動進攻把侵華日軍分割開來，<sup>18</sup>而且認為防禦戰應主動否則犧牲更大；張治中的態度更為主動積極。張治中主張在上海應該先發制敵，張迭次向南京方面提出主動攻擊建議，7 月 30 日，電曰：

我在北方作戰，固不宜破壞上海，自捐資源，然若敵方有左列徵候之一，如：(一)敵決派陸軍師團來滬，已開始登輪輸送時；(二)敵派航空母艦來滬時；(三)敵在長江艦隊來滬集合時；(四)敵在滬提出無理要求，甚至限期答覆，即斷定敵發動無疑。則因我主力軍遠在蘇、常以西，輸送展開在在需時，且上海保安團抵抗力薄，諸種關係，似宜立於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較為有利。<sup>19</sup>

對於張治中的建議，南京方面雖同意先發制敵，但也要求應等待命令才可進攻。李君山教授提到：「他也還沒有放棄『和』的希望，尤其重要的，他不願意惹上『開釁』的罪名，弄到外交上站不住腳。」<sup>20</sup>

8 月 7 日，蔣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地方各重要軍事領袖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劉湘等與會，會議決議積極備戰並抗戰，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長相機交涉，此時，蔣仍未將上海地區視為主戰場。

8 月 11 日，下午，軍政長官討論戰況，中國共產黨的朱德、周恩來、葉劍英亦與會。周恩來提到：「中央方針係全局布置，加緊華北抗戰，委座決心甚為正確」，「主戰場在華北方面，不可因一部問題而率及局部之發動、

<sup>16</sup> 「九月十四日」，〈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一)〉，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204-00001-013。

<sup>17</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臺北：國史館，2007)，上冊，頁288。

<sup>18</sup>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234。

<sup>19</sup>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臺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上冊，頁117。

<sup>20</sup>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臺大出版社，1992)，頁35。

局部之持久，以爭取全部作戰之準備」；「上海敵有武裝威脅之可能」，「惟主戰場仍在華北，其南部擾亂不過分散我兵力」。朱德說：「第一、第二戰區為主戰區，兵力已有相當多，但仍須準備兵力於該兩戰區，因敵必不以大兵在他方策動也。故在長江上海占先制，以各個擊破敵人，以各方面之勝利，而鞏固主戰場之勝利。」葉劍英認為：「在上海雖勝利不能轉移全戰局，如在平綏線置重點則可轉移全戰局，而破壞敵人整個計畫。」<sup>21</sup>從談話內容，可知當時許多人的戰略重心仍置於華北，發動上海攻勢，仍是為了「先發制敵」。

不論基於何種想法，中央與地方決定發動擴大淞滬戰役的態度上大抵一致，差別在於地方指揮官較從軍事上考量，而蔣及中央則必須考慮到國際的因素；但在戰略上則有許多的紛歧。

### 三、攻打日本的決策時機

淞滬會戰並非一直處於戰爭狀況，而是打打停停，蔣與張治中之間為何時攻打、何時撤退等有不同的意見。分幾波作說明，第一波是 8 月 13 至 14 日，張治中主張要主攻，蔣認為時機不對。蔣雖決心圍攻上海，但仍顧慮外交，以為若主動開釁，難以對國際交代，故尚未確定上海開戰日期。8 月 12 日正午，張治中部署就緒後，即電蔣請示可否於 13 日拂曉前開始攻擊。蔣傍晚急復電曰：「希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sup>22</sup>

國軍仍抱持「敵來攻就還擊，敵不來攻就做工事」。在八字橋附近，雙方衝突擴大，日軍射擊在八字橋做工之國軍，繼用小砲射擊，中方乃以迫擊砲還擊。張治中嚴切諭知前線「除非敵軍進攻，不許開槍」。<sup>23</sup>張發奎認為是由中方主動發動「八一三」軍事行動，但蔣在 8 月 13 日當天，並未下

<sup>21</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軍政機關長官談話會記錄〉（1937年8月11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上卷，頁306-312。

<sup>22</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復張治中密電稿〉（1937年8月12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341。

<sup>23</sup> 〈張治中致蔣中正何應欽電〉，1937年8月13日，〈盧溝禦侮(二)〉，《特交文電》，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2-470。

達開戰命令，張治中本來定於 8 月 13 日拂曉以前，對虹口、楊樹浦日本根據地進攻，突然奉到南京電話告知不得進攻，張一再爭取已完成攻擊準備，仍不得其果。其原因可能與上海外交團為避免在上海作戰，建議國府，改上海為不設防城市—自由口岸，國府不免猶豫有關。<sup>24</sup>

直到 13 日夜間，軍事委員會始下達命令，14 日拂曉開始攻擊虹口、楊樹浦，並令空軍出動協同陸軍作戰、海軍部封鎖江陰江面。<sup>25</sup>中央認為必須考慮國際的觀感，張則認為：「這樣耽擱了兩天，卻給了敵人一個從容佈署的機會。」<sup>26</sup>

8 月 14 日上午，中國空軍開始向黃浦江日艦轟炸，張治中於下午 3 時下達總攻命令，4 時國軍砲兵開始集中射擊，步兵攻擊前進。傍晚，蔣急令：「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sup>27</sup>攻擊行動又停止。蔣為何下令停戰？或與開戰後列強態度有關；14 日中國空軍有二彈落於英法租界，引起列強不滿。<sup>28</sup>蔣提到：「第二大隊有二機彈鉤被敵擊壞，故有二彈落於英法租界各一顆，因之英、法、美國大不滿意，責難備至，對滬戰有干涉之勢。」<sup>29</sup>這次國軍攻擊的時機與停戰的時機都與國際因素有關。程思遠對此批評：「如此前線指揮部隊逕受命於最高統帥的指揮節制，實不能把握時機，爭取機動，有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戒。」<sup>30</sup>

第二波的攻擊行動 8 月 16 日至 19 日，對虹口、楊樹浦的攻擊，中央希望趁日軍援軍登陸以前奏功的必要，16 日下午 5 時張治中召集各師長到南翔司令部指示方針，下達攻擊命令，17 日拂曉繼續開始全線總攻擊，18 日又奉到暫停進攻的命令。這是八一三戰役爆發以來第三次的停攻命令。<sup>31</sup>19

<sup>24</sup>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1。

<sup>25</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16。

<sup>26</sup>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2。

<sup>27</sup> 〈蔣中正電令楊虎、張治中：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1937年8月14日，〈籌筆——抗戰時期(三)〉，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300-00003-008。

<sup>28</sup> 〈對美關係(二)〉，國史館藏，《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3-115。

<sup>29</sup>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14日。

<sup>30</sup> 程思遠，〈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在淞滬會戰中〉，《學術論壇》，第2期(南寧，1988)，頁101。

<sup>31</sup>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頁125。

日，國軍又恢復攻擊。當時中央雖下令停止攻擊，但從張治中的電報中可以看出張仍命各部以小部隊伺機出擊。<sup>32</sup>

中央之所以再度發動攻擊：其一，外交上獲得英國的諒解，其二，情報顯示日本軍方內部有歧見。蔣在日記上記到：

本日滬戰頗有進展，南口陣地已固，此心略安。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判斷情報，倭寇陸海軍意見分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也。<sup>33</sup>

蔣極重視國際方面的反應，在作戰時特別指示張治中：「在滬抗戰國際視聽所在，我軍官兵對於紀律與行動應嚴格保守，且對歐美人士與我國民眾更須殷勤禮遇，勿稍失態，此於我國軍譽與戰局勝負影響甚大，甚望通令全體官兵一體遵照勿違。」<sup>34</sup>

其三，接受陳誠、張治中、張發奎等的建議。張治中與張發奎也知道打敗日軍非易事，因此向中央建議如果國軍援軍達到最高點仍不能擊退日軍即撤退。陳誠到滬戰發生後到淞滬考察，評估日軍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國府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 1936 年所預定之戰略。<sup>35</sup>蔣接受陳的建議向上海增兵，並發表陳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並增調部隊，赴滬參戰。陳誠認為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為時間太匆促，不及充分準備即開始進攻。<sup>36</sup>

8 月下旬後日軍全面進攻，國軍處於防守，戰事自 9 月後對國軍不利，國軍除前敵指揮官外，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經常親冒火線督戰，蔣也率領高

<sup>32</sup>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頁343。

<sup>33</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20日。

<sup>34</sup> 〈致張治中：在滬抗戰我軍應嚴守紀律與行動，勿影響軍譽與戰局〉，1937年8月15日，〈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09-023。

<sup>35</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頁53。

<sup>36</sup> 〈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函{#譚祥#}〉，1937年9月27日，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陳誠家書(七)》，典藏號008-010201-00007-005。

級將領親赴前線鼓舞士氣，然仍不敵日軍的強大火力，第二十一集團軍，原有旅長六人，數日內三死二傷，國軍撤退問題已是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9月14日，陳誠往劉行視察，見形勢岌岌可危，建議相機轉移陣地，保存實力，以便步步為營，節節抵抗。<sup>37</sup>

蔣介石也深知撤退只是時機問題，9月23日，陳誠建議調整第一線部隊，以達持久戰之目的，蔣表示原則甚妥，並開始研究「撤退時機之緩急」。24日晚間，陳誠至南翔，召集前線各軍事主官開會，詢問多方狀況，表示「現在我之目的為持久戰，若損失太大，則難達持久之目的，故以步步為營之辦法，決定部隊不再向前增加」，上海前線部隊自動後撤，以達逐步抵抗之目的。<sup>38</sup>淞滬前線國軍移轉陣地，並在閘北留一團死守，發生感動中外「八百壯士」的壯舉。<sup>39</sup>但也遭來不必要犧牲的批評。

蔣介石與白崇禧在淞滬戰役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8月12日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會前，白以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的身分建議設立大本營以資統籌，蔣則認為中日未經宣戰，不必另立名目。戰略上，白崇禧認為淞滬戰場夾在黃埔江與長江間，港灣河道，犬牙交錯，敵人以陸海空聯合作戰，極易發揮威力，而我則因交通阻滯，集中費時，在這裏反攻不易得手，為持久戰打算，最好選擇有利地帶，進行攻勢防禦較為有利。蔣也以已經將日本侵華提九國公約討論，不宜主動攻勢為由否決。<sup>40</sup>

此外對於撤退的時機，蔣白意見亦不一致，白崇禧幾次進出巡視，深知國軍與日軍實力懸殊，於11月初建議蔣下令撤退，蔣堅持不允，張發奎認為：「從整個戰略上著眼，敵人強渡蘇州河後，退卻已是無可疑義而不能再遲延的事。」前線官兵苦撐數日，實在疲憊不堪，白再度獻言撤退，蔣

<sup>37</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頁54。

<sup>38</sup> 〈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一)〉，1937年9月16、23日，《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4-00001-021。

<sup>39</sup>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臺北，1982.08)，頁22。

<sup>40</sup> 程思遠，〈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在淞滬會戰中〉，頁100。

仍不允。<sup>41</sup>

11月5日，日軍登陸杭州灣，包抄國軍側背，戰況危急。蔣命令第三戰區代理司令長官顧祝同讓精銳的第八十八師單獨留守，此舉一是為了拖延日軍進攻速度，二是為了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在抵抗日本侵略戰爭上的堅決態度，因11月6日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首都召開會議，希望以此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令再支持三日。8日，蔣下令撤退，但此時部隊已亂，命令無法下達，全軍潰退。日軍衝入第一軍胡宗南司令部，官兵死傷甚眾；薛岳第二十九集團軍總部亦被衝入，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蔣於11月9日再下令分兩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線撤退。國軍撤退過晚，無法有秩序撤退至既設之國防線，於前花費相當資源的國防工事悉數放棄，日軍順利兵臨南京城下，淞滬會戰，隨之結束。<sup>42</sup>

李宗仁對此不滿，指出：

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六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砲火之猛，猛到我砲兵白日無法發砲，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sup>43</sup>

齊錫生教授也提到：此戰役之最後失敗，其責任並非戰略之錯誤，乃是執行上的偏差。設若國軍能提早兩週脫離戰場，從容撤退以保存實力，則此戰役將是抗戰史上最輝煌的勝利。可惜統帥部未能充分掌握戰場變化，一心指望敵人防線崩潰，待敵人大量援軍登陸，並直接威脅國軍側翼

<sup>41</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674。

<sup>42</sup> 蔣雖下令撤退，仍擔心撤退對國際之影響，記曰：「蘇州河南岸以兵力用盡不能不令撤退，但並非為金山登陸之敵所牽動耳。惟藉此戰略關係，使敵知我非為力盡而退，不敢窮追與再攻，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而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必甚大也。」《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7日。

<sup>43</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冊，頁673。

防線時才倉惶撤退，已無法挽回全線潰敗的結局。<sup>44</sup>

淞滬會戰結束次年，1938年2月2日，蔣回顧到：

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崑為止，而我實力得以保存，隨時可予敵反擊也。<sup>45</sup>

蔣介石在淞滬會戰期間，在日記中有時指責將帥，如：「下午據報美國商船胡佛號為我飛機誤炸，頗有死傷，心滋不悅，甚為我空軍前途幼稚與不守紀律憂也，燥急又起。」<sup>46</sup>、「前方指揮官張文白怯弱無能，敬之任意尾用，言之痛心，但無足怪也。」<sup>47</sup>「本月第一軍與十八軍陣形皆甚動搖，前方指揮又不得其人，只想後退。」<sup>48</sup>有實記載戰況，對於撤退的時機，最主要與其期盼九國公約有極大的關係，最後證明這樣的期盼是錯誤的幻想。

#### 四、淞滬戰役中的指揮問題

從決策面而言，擴大淞滬戰役以引導日本由北向南改為由東向西的戰略，以達到持久戰的目的並無太大問題，但如何執行則相當重要，一方面讓國際認為此戰是日本主動發起，一方面真正達到持久戰的目標，三方面又要避免國軍太大損失，基於此執行面相當重要，執行分為指揮與直接作戰，包括戰前的準備，淞滬戰役之前即戰役期間，蔣對上海的佈防進行指示及思考，如下表 1：<sup>49</sup>

<sup>44</sup>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編，《抗戰勝利的代價》（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頁8。

<sup>45</sup>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臺北：國史館，2010），頁127-128。

<sup>46</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30日。

<sup>47</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1日。

<sup>48</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13日。

<sup>49</sup>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161、177、178、179、191、203；《困勉記》，頁571。彭明，《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頁316、頁318，等資料。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09-001。

表1

時間	重要指示及日記內容
7月30日	指示教導團：應集中江南岸，其江北岸任務應即另派部隊擔任。
7月31日	京滬路陣地兩翼與後方重要交通路，應撥款趕築，中央與蘇省可分任半數。
8月3日	電上海市長、警備司令、公安局長：明令上海軍事行動與一切準備，以及各組便衣隊等，皆歸張治中集中統一負責辦理。
8月5日	電張治中：委杜月笙為京滬警備司令部總參議，負責聯絡、統制上海便衣隊。
8月11日	此必裝載其陸軍來滬，其運僑回國乃宣傳也，余應下令封鎖吳淞口。
8月12日	致蔣鼎文：西即令第三十六師提先開上海，限14日到達目的地。
8月13日	致張治中：對日軍兵營與其司令部之攻擊等準備皆須詳加研討。
8月13日	令空軍於明(14)日出動，協同陸軍作戰。令海軍部封鎖江陰江面。
8月13日	致張治中：對於倭寇兵營及司令部之攻擊，及其建築物之破壞與進攻路線、障礙之掃除、巷戰之準備，皆須詳加研討，精益求精，不可徒憑一時之憤興，以致臨時挫折，或不能如期達成目的之氣餒，又需準備猛攻不落實時如何處置，以備萬一。
8月14日	令空軍分駐京、杭、揚，並準備夜間作戰，各機關應準備夜間辦公。
8月14日	致張治中：日軍集中於北四川路及迪思威路，望我軍注意。
8月15日	電令：將開到順德一帶之戰車星夜調回上海，戰車防禦砲亦調兩連回滬。
8月15日	致張治中：在滬抗戰我軍應嚴守紀律與行動，勿影響軍譽與戰局。
8月15日	致張治中：我軍攻擊前進陣地工事應重加修正，始能進退自如。
8月16日	致張治中：第三十六師，加入第八十七師方面，預定明拂曉全線總攻擊，一鼓殲滅敵軍，佔領虹口為要。
8月16日	致黃紹竑：第三、第十一、第十四三個師團出動地點以上海為主。
8月16日	令速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迫擊砲等各種砲彈前往接濟。
8月17日	條諭周至柔：我陸空軍在上海協同作戰。
8月18日	致錢大鈞：對上海張司令及第八十七師、八十八師各師長以下之官兵，應致電慰勞，以示體恤懷念。連日苦戰不惜犧牲一切，壯烈堪嘉，殊不愧為我總理革

	命之信徒，茲特派陳次長、熊主任來滬慰勞，望各官長對於各士兵未出戰時之體力精神應於特別保養，務使多加安息，飲食多備滋養物料，以增我戰鬥實力，對陣亡各官兵姓名，希即詳報，以便撫卹，而資昭忠。
8月18日	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等：抽調最精壯的士兵五千至滬。
8月18日	條諭黃紹竑：浦東部隊應嚴防敵陸軍由黃浦江面登陸。
8月20日	條諭江陰區江防司令歐陽格：令歸海軍陳紹寬統一指揮。
8月21日	條諭張發奎：金山衛有日軍水兵登陸偵察，務派部隊嚴密防範。
8月22日	指示交通部長俞飛鵬：據悉敵海軍要切斷上海個陸海電線，應切實注意準備一切。
8月22日	條諭張治中：聞敵人司令部在百老匯大廈七樓。
8月23日	令：速調龍華、松江部隊向滬西集中。
8月27日	致顧祝同、張發奎：張華濱敵人至今尚不能擊退，則敵必於該處有一個師團之登陸，明後日敵必大部登陸，向我軍進攻，故我軍在張華濱與蘊藻濱一帶，務須配備重兵，以防不測。
8月27日	電話顧祝同、陳誠、張發奎等：對張華濱與川沙鎮上陸之敵，應做整個殲滅計畫，不可再作局部各個計劃，否則必為敵軍各個擊破。吳福線此時不必留兵，51D、58D皆應另先到張華濱線布置。
8月28日	致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勿忘於9月8日前集中京滬路。
8月28日	條諭張發奎：敵企圖在浦東登陸請嚴令各部防範。
8月28日	條諭顧祝同：阮肇昌師最好仍備為滬西與滬北兩方總預備隊。
8月31日	條諭黃紹竑：鎮江等處江防與阻塞從速限期完成。
8月31日	條諭黃紹竑：吳福與澄錫、滬杭各線陣地之編成應指定部隊限期完成。
9月3日	致張發奎：敵軍在浦東登陸，我軍除留一團致兩團兵力，在浦東、白鶴港、川沙、南匯一帶個重振分駐，化整為零，乘機向敵陣不時襲擊擾亂，作為便衣別動之用。
9月5日	致張發奎：第十六師到達龍華閔行之線時應構築前進陣地。
9月6日	條諭錢大鈞：指示軍隊移防。
9月7日	電張發奎：速在各口岸多設鐵絲網，使敵船不得近岸及掃射殲滅。

9月9日	致顧祝同：上海市及其沿江之防禦工事，應速指定部隊負責布置。
9月15日	致第八師師長陶峙岳：第八師即調京滬路，其移防可先派第四師接防。
9月16日	致劉建緒：十九師應即令集滬杭路。
9月26日	致張發奎：杭州到上海各河流，凡可通小火船之處，即應準備防治辦法，勿使其裝甲小火船衝入我陣地帶。
9月28日	條諭錢大鈞：第五十二師現駐何處，應另調滬西一帶參戰。
9月29日	條諭錢大鈞：第五十師，令開京滬線。
9月30日	致顧祝同等：通令上海最前線各官兵，必須練戴防毒面具，每日以連戴二小時，逐日增加時間，能連戴至二十四小時為度。
10月25日	致張發奎：敵必於近期内進攻浦東，務希不分晝夜嚴密防範，夜間尤為重要。
11月2日	令第九十三師全部速調京滬線。

蔣對於淞滬會戰極為關心，為正確掌握真實的戰報，一再三令五申要求各戰區詳實呈報，<sup>50</sup>蔣彙整後提供當地指揮官參酌，如8月27日，致顧祝同、張發奎：

張華濱敵人至今尚不能擊退，則敵必於該處有一個師團之登陸，明後日敵必大部登陸，向我軍進攻，故我軍在張華濱與蘆藻濱一帶，務須配備重兵，以防不測。<sup>51</sup>

蔣指揮並調度各方部隊增援，這些都無可厚非，但有時過細的指導，實無此必要，如戴防毒面具的訓練，須戴多少小時、部隊應如何移防等，簡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揮官無差別。

其次的問題是調動指揮系統，第十八軍(羅卓英)本歸張治中指揮，後來轉歸第十五集團軍陳誠指揮，統帥部並未通知張治中，引起張的不滿。8月18日，蔣下令任命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引來張治中不滿：「陳辭修資格太淺，怎能指揮我！」馮玉祥雖是兩人直屬上司，但無法調和兩人摩擦張治中與陳誠的不合早在開戰之初不到十天就已發生，9月21日，

<sup>50</sup> 如1937年8月6日，軍事委員會侍從是第一處錢大鈞向蔣呈報日軍的行動。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163、164。

<sup>51</sup>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作戰經過(二)》，頁179、180。

蔣終於下決心，將馮玉祥調至華北第六戰區司令官，蔣兼任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指揮。9月23日，張治中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管理部部長，左翼軍分成兩部分，左翼軍由陳誠指揮，下轄陳誠兼領的第十五集團軍與薛岳率領的第十九集團軍，中央軍由朱紹良指揮，還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認為：「陣前易帥絕非良策，因為新的主帥對戰場形勢不甚熟悉，此外陣前易帥會影響士氣。」<sup>52</sup>其實有關此一人人事調動，也非完全是蔣的主意，早在9月初，張治中對於淞滬的戰局頗為自責，對白崇禧提出引咎自責，陳誠於9月4日提供個人的意見，<sup>53</sup>蔣在9月15日，曾考慮第三戰區高級指揮官之更動，認為陣前換將並不適宜，故未實施，但仍撤換張治中由朱紹良接中央兵團總司令。<sup>54</sup>蔣積極介入淞滬戰事，大致可以用顧祝同就任戰區副長官為分野，在此之前戰事計畫由張治中負責主導，到8月15日顧祝同接受副司令長官後，蔣指導戰事的意志力愈來愈強。<sup>55</sup>

此問題到十月又發生，10月底當上海局勢最險峻時，朱紹良被任命為甘肅省省主席，張發奎接任中央軍總司令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此時薛岳接替陳誠為左翼軍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這又再度犯了陣前易帥的缺失，張甚至認為自己是代罪羔羊。

雖然在9月20日之後蔣兼第三戰區司令，指揮權較統一，但陳誠與朱紹良分別肩負指揮之責，特別是陳誠秉承南京最高統帥意旨，儼然為總攬戰場作戰的指揮官，指揮系統疊床架屋，恐也是淞滬戰役的重要問題。蔣的另一的問題是直接調動地方部隊，張發奎批評蔣，砲兵陣地的佈署是錯的，應該轉移，蔣干涉砲兵連的調配，這個層級連中央軍總司令都極少干涉，更何況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sup>56</sup>

在實際作戰方面亦出現一些問題，首先，淞滬戰役初期，未能澈底集

<sup>52</sup>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44。

<sup>53</sup>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頁290。

<sup>54</sup>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臺北：天下文化，2013），上冊，頁149。

<sup>55</sup>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頁51。

<sup>56</sup>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246。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1975），頁60。

中兵力形成重點，圍攻上海之時用三個師，顯有不足；其次，攻擊地點選擇不當，喪失主動，最先將重點指向的陣地最堅強部——海軍部及虹口公園一帶核心陣地，不僅均告失敗，且折損慘重，8月20日雖轉移主攻，指向匯山碼頭，因第三十六師不待第九十八師到達率先發起攻擊，後繼無力，得而復失。<sup>57</sup>8月23日，蔣聞日軍在獅子林川沙鎮登陸，斥責此張治中之布置與指揮，猶如兒戲。<sup>58</sup>9月31日，蔣又提到：「自上週攻入楊浦唐山路一帶各師，自動撤至張華濱，相隔數日，而張治中司令尚無報告，彼為司令，乃浮薄無識，以戰事為兒戲，可痛之至。」<sup>59</sup>之後蔣在日記中直接檢討指揮官指揮不當，如9月13日第十八軍陣形動搖，認為是：「此由前方指揮，不得其人，故指向後退呼。」<sup>60</sup>其三，各地攻守之間的問題及後期作戰轉移的問題，如日本突破國軍蘆藻沿岸國軍第九、第二十一集團軍之轉移攻勢無成果，且損失極大，此時增援已窮，國軍如能主動轉移，以策後圖，當不至於損失如此巨大。11月5日，蔣聞日軍在金山衛登陸，曰：「此司令張發奎換防疏忽之過也，可嘆。」<sup>61</sup>其四，軍種協同作戰、部隊機動遲滯等，也是長期以來國軍作戰的另一問題。<sup>62</sup>這些都不是何時進攻、調動將領等的責任，因此在談指揮權的問題，不能只從地方的立場著眼。

## 五、結論

淞滬會戰中，日本侵略者4次增兵，先後投入海軍陸戰隊和陸軍部隊14個半師團兵力，共約28萬人，運用軍艦30、40艘，飛機400餘架，戰車300、400輛，並宣稱1個月內占領上海。國軍投入上海的總兵力約70餘萬人，犧牲非常慘重，胡宗南的部隊幾乎損失泰半。參加淞滬會戰的中

<sup>57</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頁840-845。

<sup>58</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23日。

<sup>59</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31日。

<sup>60</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13日。

<sup>61</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5日。

<sup>62</sup> 〈淞滬會戰〉(四)，檔案管理局，《國軍檔案》，檔號0026/152.2/3813，頁161。

國軍隊同仇敵愾，以劣勢裝備和血肉之軀，冒著敵人的現代化裝備和陸海空聯合作戰的強烈炮火，前仆後繼，奮力拼搏，斃傷日軍 4 萬多人，堅守上海達 3 個月之久，粉碎日本速戰速決、吞併中國的野心，同時，中國軍民在上海的英勇抗戰也大大提高了中國軍隊在國際上的威望，其功績不可磨滅。

擴大淞滬戰役顯然是國府中央主動，此時中央與地方的立場較為一致，都希望「先發制敵」以待國際局勢轉變及日本內部變化。蔣決定擴大淞滬戰役，確實使日本原先由北向南的進攻模式，逐步被轉為由東向西，拉大日軍進攻的點與面，達到中國持久抗戰的目的，然為達到此一戰略，國軍也付出極大的代價，由於不斷投入大量援軍，戰爭規模隨之擴大，國軍損失甚大，蔣嫡系的菁英部隊如胡宗南的第一軍在此戰役中損失過半，加以延緩撤退的時機，擴大損失。因此可以說蔣在擴大淞滬戰役決策是正確的，但也要為延緩撤退造成更多的傷亡負責。

其次就指揮與執行層面而言，首先是蔣的領導風格問題，長期以來蔣常越級指揮，減弱地方指揮官的自主性，其次是淞滬戰役戰鬥序列更動頻繁，一開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幾個集團軍之間互不協調，張治忠與陳誠不合，而身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馮玉祥無法折衝，9 月 20 日後蔣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總司令，指揮系統較能貫徹，但在過程中進行人事與軍隊的臨時調動，如張治中與朱紹良的調動，引發當事人及同情者的反彈，對作戰士氣帶來負面的影響。

戰爭的過程，最高統帥與前線指揮官有不同意見，不應被無限的擴大，畢竟作為最高的領袖由於獲得的情報較為多元，較能從全面格局考量(包括國際因素)，又可以調動其他軍援，對地方軍事行動仍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近十年來研究軍政歷史者逐漸銳減，原因之一，即是無法突破過去研究的框架，許多問題各說各話，或留於流水帳的敘述，士官兵的傷亡人數，常有誇大，不能全面掌握史料或過度依賴單一史料的問題極為嚴重。戰事的成敗因素，除敵方的因素之外，戰略、戰術、指揮及平時士官兵的訓練、後勤補給等都有關係。如能著重較細的研究與分析，功過並陳，並使用多元的資料，將有助於開啟新的軍事史研究。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檔案

〈致張治中：在滬抗戰我軍應嚴守紀律與行動，勿影響軍譽與戰局〉，1937年8月15日，〈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300-00009-023。

“Zhi Zhang Zhizhong: zai Hu kang zhan wo jun ying yan shou ji lu yu xing dong, wu ying xiang jun yu yu zhan ju,” (1937.8.15), “Song Hu hui zhan yu Nanjing che shou,” Guo shi guan cang,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20300-00009-023.

〈張治中致蔣中正何應欽電〉，國史館藏，〈盧溝禦侮(二)〉，《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2-470。

“Zhang Zhizhong zhi Jiang Zhongzheng He Yingqin dian”, Guo shi guan cang, :Lu gou yu wu (2)”, *Te jiao wen dian,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90105-00002-470.

〈淞滬會戰〉，檔案管理局，《國軍檔案》，檔號0026/152.2/3813。

“Song Hu hui zhan”, Dang an guan li ju, *Guo jun dang an, dang hao* 0026/152.2/3813。

〈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一)〉，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204-00001-013。

“Song Hu zhan yi zhen zhong ri ji(1)”, Guo shi guan cang, *Chen Cheng fu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8-010204-00001-013.

〈陳誠至譚祥家書〉，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201-00007-005。

“Chen Cheng zhi Tan Xiang jia shu”, Guo shi guan cang, *Chen Cheng fu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8-010201-00007-005.

〈對美關係(二)〉，國史館藏，《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3-115。

“Dui mei guan xi (2)”, Guo shi guan cang, *Te jiao wen dian,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90103-00003-115.

〈蔣中正電令楊虎、張治中：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國史館藏，《籌筆——

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300-00003-008。

“Jiang Zhongzheng dian ling Yang Hu, Zhang Zhizhong: jin wan bu ke jin gong, ling hou hou ming”, Guo shi guan cang, *Chou bi: kang zhan shi qi,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10300-00003-008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cang, *Jiang Jieshi ri ji*.

## (二) 史料彙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Zhong guo di er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Kang Ri zhan zheng zheng mian zhan chang*, Nanjing: Feng huang chu ban she, 2005.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4。

He, Zhilin, bian. *Chen Cheng xian sheng hui yi lu: Kang ri zhan zheng*, Taipei: Guo shi guan, 200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臺北：國史館，2007。

He, Zhilin, bian. *Chen Cheng xian sheng shu xin ji: yu Jiang Zhongzheng xian sheng wang lai han dian shang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07.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作戰經過(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

Qin, Xiaoyi, zhu bian. *Zhong hua min guo zhong yao shi liao chu bian: dui Ri kang zhan shi qi, di er bian zuo zhan jing guo (1)*,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1.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二編作戰經過(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

Qin, Xiaoyi, zhu bian. *Zhong hua min guo zhong yao shi liao chu bian: dui Ri kang zhan shi qi, di er bian zuo zhan jing guo (2)*, Taipei: Zhong guo guo min dang zhong yang dang shi wei yuan hui, 1981.

國史館編，《困勉記》，臺北：國史館，2010。

Guo shi guan, bian. *Kun mian ji*, Taipei: Guo shi guan, 2010.

葉健青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1冊，臺北：國史館，2010。

Ye, Jianqing, bian.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dang an: shi lue gao ben*, di 41 ce  
Taipei: Guo shi guan, 2010.

### (三) 專著

丁治磐，《丁治磐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Ding, Zhipan. *Ding Zhipan ri j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2.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

Wu, Xiangxiang. *Di er ci Zhong Ri zhan zheng shi*, Taipei: Zong he yue kan she, 1973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臺大出版社，1992。

Li, Junshan. *Wei zheng lue xun: lun kang zhan chu qi Jing Hu di qu zuo zhan*, Taipei: Tai da chu ban she, 1992.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臺中：永連清出版社，1986。

Li, Zongren. *Li zong ren hui yi lu*, Taizhong: Yong lian qing chu ban she, 1986.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Xu, Yongchang. *Xu Yongchang ri j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91.

郝柏村，《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冊，臺北：天下文化，2013。

Hao, Bocun. *Hao Bocun jie du Jiang gong ba nian kang zhan ri ji*, shang ce, Taipei: Tian xia wen hua, 201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

Guo fang bu shi zheng bian yi ju, *Guo min ge ming jian jun shi di san bu: ba nian kang zhan yu kan luan (2)*, Taipei: Guo fang bu shi zheng bian yi ju, 199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日戰史（淞滬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Guo fang bu shi zheng bian yi ju, bian yin. *Kang Ri zhan shi (Song Hu hui zhan)*, Taipei: Guo fang bu shi zheng bian yi ju, 1982.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臺北：谷風出版社，1989。

Zhang, Zhizhong. *Zhang Zhizhong hui yi lu*, Taipei: Gu feng chu ban she, 1989.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Zhang, Fakui kou shu. *Jiang Jieshi yu wo: Zhang Fakui shang jiang hui yi lu*, Xianggang: Xianggang wen hua yi shu chu ban she, 2008.

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Chen, Cheng. *Chen Cheng hui yi lu: kang Ri zhan zheng*, Beijing: Dong fang chu ban she, 2009.

彭明，《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Peng, Ming. *Zhong guo xian dai shi zi liao xuan ji*, di 5 c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49.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1975。

Feng, Yuxiang. *Wo suo ren shi de Jiang Jieshi*, Xianggang: Qi shi nian dai za zhi, 1975.

黃紹紘，《黃紹紘回憶錄》，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Huang, Shaohong. *Huang Shaohong hui yi lu*, Guangxi, Guang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1.

#### (四) 專文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抗日戰爭研究》，第3期(北京，1992)，頁1-21。

Yu, Zidao. "Lun kang zhan chu qi zheng mian zhan chang zuo zhan zhong xin zhi zhuan yi: yu Taiwan xue zhe tao lun fa dong song hu hui zhan de zhan lue yi tu wen ti", *Kang ri zhan zheng yan jiu*, di 3 qi (Beijing 1992), 1-21.

姜良芹，〈從淞滬到南京——蔣介石政戰略選擇之失誤及其轉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1期(南京，2011)。頁103-115。

Jiang, Liangqin. "Cong Song Hu dao Nanjing: Jiang Jieshi zheng zhan lue xuan ze zhi shi wu ji qi zhuan xiang", *Nanjing da xue xue bao* (zhe xue · ren wen ke xue · she hui ke xue), di 1 qi (Nanjing, 2011), 103-115.

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北京，1994)，頁213-220。

Ma, Zhendu. "Kai pi Song Hu zhan chang you wu 'yin di nan xia' zhan lue yi tu", *Kang ri zhan zheng yan jiu*, di 2 qi (Beijing, 1994), 213-220.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臺北，1982.8)，頁61-102。

Zhang, Boting. "Ba yi san Song Hu hui zhan hui yi", *Chuan i wen xue*, di 41 juan di 2 qi (Taipei, 1982.8), 61-102.

彭孟興，〈蔣介石上海抗戰決策研究〉，《軍事歷史研究》，第7期(南京，1994.2)，頁55-63。

Peng, Mengxing. "Jiang Jieshi Shanghai kang zhan jue ce yan jiu", *Jun shi li shi yan jiu*, di 7 qi (Nanjing, 1994.2), 55-63.

程思遠，〈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在淞滬會戰中〉，《學術論壇》，第2期(南寧，

1988), 頁100-101。

Cheng, Siyuan. “Wo suo zhi dao de Bai Chongxi: zai Song Hu hui zhan zhong”, *Xue shu lun tan*, di 2 qi (Nanning, 1988), 100-101.

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第2期(北京,1995),頁45-60。

Huang, Daoxuan. “Song Hu zhan yi de zhan lue wen ti”, *Kang ri zhan zheng yan jiu*, di 2 qi (Beijing,1995), 45-60。

齊錫生著,〈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編,《抗戰勝利的代價》(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頁3-23。

Qi, Xisheng, zhu. “Kang zhan zhong de jun shi”, shou ru Xu Zhuoyun, Qiu Hongda, bian, *Kang zhan sheng li de dai jia*,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e1986), 3-23. 3-23。

## **The Decision and Command of the Songhu Battl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Lin, Tung-F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hiang Kai-Shek's direct command of the frontline battles had long been a common occurrence. Such direct command had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warfar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Firstly, the attitudes of central and regional command towards the Songhu campaig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trategic decision to expand the campaign will be introduced. The attitudes of the central and regional command towards expanding the Songhu campaign were generally unanimous, but their differences would be the considerations of regional commanders who had enlisted in the army, and the fact that Chiang and the centre had to consider international factors.

Secondly, in discussing the occasion for the decision to attack the Japanese, the battle of Songhu was not necessarily a constant battle situation, but rather a set of repeated skirmishes. There were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Chiang, the local command, and specially Zhang Zhizhong with respect to when to attack and when to retreat. Chiang kept his focu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his mind, but Zhang Zhizhong and other high ranking frontline officers, conversel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n the whole, in this respect, central and regional commands were in relative agreement.

Lastly, in discussing the command and execution of the Songhu military campaign, the matters of how Chiang supplied frontline commanders with all sorts of information, mobilized the command system, and directly issued tactics will be analys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he was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ranking leader, due to the intelligence that he obtained being more diverse, and

the emphasis he placed on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s. But commanders in regional warzones, conversely, were familiar with local terrain and surface features, and were clearer on the state of enemy forces in their local area. The highest commander and warzone commanders were able to cooperate closely, which was beneficial for the undertaking of the battle, so,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Chiang Kai-shek, battlefield commanders became dominated strategic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Songhu military campaign, the principle and decision to expand the campaign were not necessari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its execution, there were some issues. First of all, were changes in the command system; secondly, the command system of the theatre of operations adjusted repeatedly within two short months, leading to the people in charge becoming displeased; moreover, as for sacrificing many elite troops from the army, it is open to debate whether or not that this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along with the occasion for final retreat.

**Keywords: Command 、 Chiang Kai-Shek's 、 Zhang Zhizhong 、  
the Battle of Songhu, Anti-Japanese War**

